

猫头鹰学术文丛

# 鲁迅的生命哲学

王乾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的生命哲学 / 王乾坤著 .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7

(猫头鹰学术文丛)

ISBN 7-02-002944-2

I . 鲁 … II . 王 … III . 鲁迅 - 生命哲学 - 研究 IV .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153 号

责任编辑：一 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35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3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8.60 元

## 致读者

有一种猛禽，古时名“枭”，俗称“猫头鹰”。它习性古怪：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便睡去，也睁着一只眼睛。这独异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猫头鹰飞翔时悄无声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难免令人惊悚。

在希腊神话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企求新声。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编 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 自序

美籍华裔学者王浩先生在《中国和西方哲学》中称：“鲁迅和王国维都在文学上有很好的作品，但在形式上甚至内容上，鲁迅更能创新，更能超越自己私人生活。应该说鲁迅作了更多更久的思想家的工作，是一个广义的哲学家。”<sup>①</sup> 这是我所读的著名哲学家中，唯一这样称谓鲁迅者，所以印象很深。一位以数理逻辑、数学哲学为业的学者有如许的人文眼光，让人佩服。

不过，本书以哲学为题，却丝毫没有将鲁迅作为哲学家研究的意思。以其殊异的生命性情，将其归于任何体制性的“家”都是不尽妥帖的。在不算长的生涯中，他当然也做“家”们所做的事，比如说，也研究学术，也当教师，也写小说，也编杂志，也弄翻译，并且做得很认真，富有成就。然而有如卢梭、尼采，他不愿意以任何一种“家”（甚至包括“文学家”）的角色定位自己。任何一种实体性目标对他都构不成生命冲动，任何一种“家”的成功对他都没有根本性的慰藉效力。他

<sup>①</sup> 《九洲学刊选编》（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1月第1版，第37页。

无疑属于那种来到世间就没有准备成“家”的天才。

然而，他又决不是中国历史所熟悉的高蹈者、逍遥者。他讨厌于此，而终生“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守护着所谓人之“自性”的东西。这东西不仅不是任何可以由“家”、“门”、“功业”、“目标”之类所能代替的对象，也不是靠菩提树下求道、面壁千仞地悟道所能济事。他的法子是用“无所有”消解一切实体性希望，孤魂野鬼一般地在一种似路非路的人生之路上，无休止地踉跄前行，以不断的“走”显证其信守。同时，他决不独善其身，而冷静地观察着、洞悟着这个世界，并天真地、不识时务地向世人报告他所独识的、通常是很不吉利的消息，从而把他的“私有财产”或“奢侈品”撒向人间。领受这份财富不容易，他因此而成为异类。

不管是以苏格拉底、西塞罗等之“学习死亡”，还是以康德之追问“人是什么”，以及萨特、海德格尔们之寻回个人“存在”，抑或以中国古代的“致良知”来界说哲学，都可以如是说：在中国本世纪不多的思想人物中，鲁迅当属最具哲学精神气质的人物之列。然而，他不是“哲学家”。

他的精神天马行空，两脚却立于苦难的大地。他禀着高傲的精神情怀，憎恶流俗，诅咒庸众，乃“平均人”或“一般人”之死敌，却同时深深地挚爱着被欺侮和被蹂躏的奴隶，并且自觉地从士大夫中叛逃出来而成为奴隶的朋友。这使他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无法归类的一个人、一个思想者。

反观中国几千年的精神资源，无论如何，鲁迅是一篇独异的故事，一个不曾有过的故事。然而，生活中偏偏就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人们自以为最熟悉的人往往可能正是自己最不熟悉

者。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鲁迅对于我们就是这样一种人。虽然他已经死了六十年，虽然对他的研究被称为“显学”。

我常常惊讶于这种自明，然而我把自明当起点。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地进入另一个人。所以我对本书的设计，主要是个人性的读解，以便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对这样一个人物变得熟悉一些。当然，我同时也赞同“人同此心”的说法，否则大家就不可以合称为“人类”。因此在写书之中，也含有另一重期许。

正如书名所示，这里所读解的是鲁迅的生命哲学。因它所提交给读者的，是一种生命类型的个案考察。从学术上说，当然也不妨看作生命哲学、思想史的一例个案研究。不过，这一取向，并非通常所谓技术“角度”的选择，而纯然是与鲁迅的相遇所决定。一个世纪之前，在德、法等欧洲国家出现了“生命哲学”流派。德国的狄尔泰作为创始人，首次使用“生命哲学”一词。这种哲学对本世纪初的中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的柏格森在“五四”前后就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名字，很多派别的学者与之有关。然而本书的取名与此无关，也不准备重拾这些历史的话题，虽然二者在实际上不无联系。这里所谓“生命哲学”主要是一种范围上的限定。无非是说，它所求解的，是鲁迅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态度。就事论事，别无深意。

生命哲学最好的相遇方式是无言，尤其是不宜作理论逻辑的铺张。这也许是此类性质的对话不同于其它学术研究的一个地方。笔者本来愿意像很多读书人那样，与书本神交，如是足矣。无奈一个以职业谋食者，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完成工作量”，必须有“学术”、“理论”的阐述，而且必须形成“著

作”。更无奈的还在于，自己无法彻底切断对“概念木乃伊”的偏好；我对它的恨与爱同在，并在总量上相等。

一旦有了这许多矛盾、杂念和人性上的弱点，在体式上就注定免不了“妥协”、变通和后现代主义者反感的结构性制作。我已经尽了努力，以便与述说对象大体保持一个相谐的风格。但我知道没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中国既有的话语模式显然不够支持对于鲁迅的阐释，为了帮助理解，不得不涉及到一些西方人物，不得不借用他们的一些学术概念。我相信，这样做在精神总体上未失大端，但有时难免损却原旨。从学术言，这种相异是应该辨析的，然而，倘若过多过细地说明或注疏，又会节外生枝，掩泥带水，把题旨冲淡，让人不知所云。因此，只好两弊之中取其轻。

如上都是我的不彻底处。开脱着说吧，也是“学术”或语言本身的短处，甚至是生而为人的麻烦。我无法彻底克服其弊与烦，彻底克服很可能就会同归于尽。我显然做不到这样洒脱，至少现在。何况同归于尽根本就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整个取消问题本身。我只希望读者不要过分拘泥于本书的言述方式或结构，一如后文要提到的：将其当作过河即拆的桥。

**目录**

---

自序 ..... (1)

**第一章 终极的消解与眷注** ..... (1)

---

一 一个前导性话题 ..... (3)

---

二 “中间物”辩 ..... (10)

---

三 生命—时间观 ..... (18)

---

四 “消解”，而非“勾销” ..... (34)

---

**第二章 古今中西之间** ..... (43)

---

一 中庸之道 ..... (46)

---

二 逻各斯主义与道 ..... (56)

---

三 新神思宗 ..... (68)

---

四 佛缘 ..... (75)

---

**第三章 自由与他由** ..... (92)

---

一 “朕归于我” ..... (95)

---

二 “惟此自性，即造物主” ..... (109)

---

三 “众数”与“物质” ..... (122)

---

**第四章 自律与他律** ..... (134)

---

一 不能含糊的“声音” ..... (135)

---

二 “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 ..... (140)

---

三 沉沦与“忽然惊醒” ..... (152)

四 声发自心	(159)
五 良知：存在论的和价值论的	(165)
<hr/>	
第五章 勇气：出死入生	(173)
一 价值与勇气	(174)
二 “无所希望”	(180)
三 拒绝逍遥	(190)
四 创伤的慰藉	(197)
<hr/>	
第六章 苦难与爱	(214)
一 第二视力	(214)
二 摩罗：为爱而反叛	(225)
三 伟大的俄罗斯	(231)
四 以流血的心去爱	(242)
五 “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	(254)
<hr/>	
第七章 毁灭中的大欢喜	(262)
一 双重的被告	(265)
二 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	(271)
三 意志为死亡立法	(279)
四 人生的路	(287)
五 关于崇高的判断	(293)
<hr/>	
第八章 盛满黑暗的光明——读《野草》	(301)
一 梦与人生	(302)

二 深渊的梦魇.....	(309)
三 例解.....	(316)
四 叫出无爱和无所可爱的悲哀.....	(336)
后记.....	(341)

## 第一章 终极的消解与眷注

在拙著《由中间寻找无限》的后记中，曾申明因故作罢了最后一章。而本书的开篇，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遗缺的弥补与完成。

弄理论者多少有一种体系欲，这是科学主义时代锻压给人的胎记。

对任何一种非理论形态的思想类型来说，刻意用“体系”来描述之，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不是从学术体制的意义上来读这个词，非体系未必不是一种体系。尤其是当我们要对其作一种比较性研究，或给出一种界说、一种识别的时候，至少不妨权且“对不可规定以规定”，将其处理为一种范型。

这便是作者为什么尽管并不情愿却又不能不“就范”的主要原因。是为权且为之。就像欲瞭望某个景点，有时必须借助脚手架或瞭望台，一旦目的达到，就该拆除。以下的全部阐述，可以看作这样一个为了拆除而搭建的脚手架或者别的什么。

我们现在开始这个艰难的工作。

任何一种思想范型都有一些概念支持。如果要把鲁迅的思

想归纳为一种范型，那么其所由建构的基础是什么？或者更具体一点说，这个思想范型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如果将其文本处理为逻辑语式，则有必要找到这个概念，或者说归纳出这个概念。

作为一个最简单的规定，这个概念应有着最大的外延。它对于鲁迅的世界应该存在一种普遍关联，分别来说，它至少必须具有下述特点：

一、既然居于核心的位置，它应能揭示鲁迅的全部精神火花和思想行为的最本原的内部驱动；由它出发，可以窥探其复杂、矛盾的一生及其精神现象，可以走进鲁迅的各个思想侧面。并且在这些思想侧面中，它都应该有自己的语境化身或变式。

二、它可以是但不应只是一个经验性术语、感性术语，而必须有一种抽象的理论品质和宏观统摄力。在逻辑上，它必须有助于同其它中外思想遗产进行理论上的比较和对话。

三、正因为它具备整全性和丰富性，所以同时有最大的可识别性。由它出发而阐述的思想类型，可以标识鲁迅的特点和地位。也就是说，借助于它，人们可以看到，鲁迅究竟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思想、精神范型和人格样式。

能够兼具这些属性和充任其职的，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作符码：“中间物”。鲁迅的世界即以此为中轴，辐辏开合。理所当然，鲁迅的生命哲学也应从这里说起。

## 一 一个前导性话题

作这样一种结论在先的“倒金字塔”的叙述虽然是唐突的，我想还是开宗明义摆出来为好。不过在对这个代码作分析之前，不妨暂时搁置一下对这个概念的论证，先做些回顾性的工作。这样虽嫌拖泥带水，然而这种自我交代也许有便于读者进入论域。

与一些先行者稍有不同，笔者不是由文学而是由对思想史的爬梳，顺序地走进鲁迅的。当我走进这一驿站的时候，鲁迅研究已经蔚为大观。这是八十年代最后几年的事。

中国近二十年的人文研究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紧紧地缠在一起的，尤其是与“文革”后的思潮相互激动而构成历史的。在“文革”长大，而后又有机会进入学术生活的一批知识者，其“研究”一开始就不是“价值中立”的。作者更不能免俗，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有关鲁迅的文字多带有“洗刷耻辱”、“呐喊”、“参与”的特点。严格地说，这不能算研究。

不过，过来人以缺乏学术性嘲讽那段历史，是自以为深却失之于浅，自以为雅却落于俗的。用自己生命的真情走过的足迹，无论多么幼稚，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因为那是一种本意义上的生命创造，是那个时代中国青年学人用生命的真情和稚气书写的史。精神史上可以被奚落的对象也许很多，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幼稚。

当然，长久地恋于这种格局，毕竟是有问题的。因为生命之火可以烧出真理，也可以烧掉真理。学术，尤其是人文性质

的学术，它当然要置足生活，这是其生命之所寄；但它既然独立为一种学科，也就应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有生活之外的学术延展。离开了这一维，恐怕也是取消人文研究本身。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阴差阳错，有机会退入书房坐下来读书，也有了可能反思自己的学术态度。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笔者把思路重新归置于思想史，用学术的语言与鲁迅对话。之所以没有很快从这个驿站离去，别寻课题，是因为这个对象太有学术解读的吸引力，而其中好多至为关键的问题域，并没有人涉足。

我不否认情感的影响，但这个时候的研究动机已不止于此。我宁愿将情感升华为一种属于我自己的生命张力和学术胸次。毋宁说，在研究中，我有意地纠正情绪对人的判断力的滋扰，为鲁迅的“批评者”张目，以兼听则明的办法校准人和我的偏爱：“我们太深太久地陷入某种批评格局和情绪，要有新的转机，必须有一个较长的遗忘期。”<sup>①</sup>这些话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的。的确我们现在离鲁迅还太近，既有的研究隋性不会不拖着活人走。学术的冷静与自律是绝对必须的。

康德之于卢梭的研究态度曾给我以启发。

我们知道，卢梭曾经给康德一生以重大的影响，以致康德步入老境的时候还这样深情地说：“我自以为爱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对推动知识进展的不倦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心满意足。我一度认为，这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够有助于所有其他人去确立人权的话，

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劳工还不如。”<sup>②</sup>

但是对于研究，他说：“读卢梭的著作，必须读到他那华彩的文笔不再使我神魂颠倒为止，只有到那时候，我才能借理性去审察他。”<sup>③</sup>正因为同时有了这份冷静，他才能一如卡西尔所说，康德在卢梭身上所理解和赞赏的东西，正是那些不为卢梭周围的人群所领略的东西。这些周围的人群，包括他的敌人，他的同胞，他的密友，他的情人和无数的狂热的追随者；而这个时代正是在卢梭和同代作家大多辞世之后，正是在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沉寂之后。

不过人有精神的自由，并非只有通过生物性历史来遗忘既有情结，真理的母亲可以是但不一定是时间。我于是凭借这种自由，尽可能拉开距离，一一地推敲有关鲁迅的既有的说法：反封建、启蒙主义、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科学民主……我承认这些概括对于认识鲁迅，尤其是对于实践，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作为研究，我不能满意于此。因为我发现，倘从某一个角度揭示鲁迅的思想属性或历史片断，这些说法才是有效的，而用作一个思想家的范型的描述，则是模糊的，我们无法从中建立一个的特独（！）的精神轮廓。即便是在这些命题前加上程度副词“最”，也不能让人知道“最”在何处；况且，这些主义的程度、高度、深度之“最”者不一定就是鲁迅。他并不是这些主义的经典性代表。

对这样一位品质殊异的人物，无论如何不能这样用一套含糊语言打发过去了事。于是尝试摆脱思维的习惯和叙述方式，从这些思想的碎片中找到多样性联结，寻找一种更为个性化的规定性。这便是我的起点。

笔者几年前在回答一位编辑朋友关于“选题”之问时说：谈到现在的选题，叫人惭愧，因为这么多年了，自己还在原来的问题上打转。可以这样说，现在和过去，在鲁迅研究上我只有一个“选题”，那就是究诘、阐发鲁迅思想的原点（元点）。④

这样的追根求源，固然与我的行当习惯有关，同时也是我在研究鲁迅中，发现其斑驳的思想和复杂的人生中，确有一个影响其生涯的生命轴心。可是这种研究几乎无资料可以借鉴。在“向壁虚构”之中，我当然也同时以虚怀态度搜索着先行者、同道者们的建树。

一九九一年，在参加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大会期间，听说青年学者汪晖的“历史中间物”说受到了颇有些局面的责难，这使我很纳闷而且惶恐。因为我有一本即将脱手的书稿（即《由中间寻找无限》，当时拟名《由有限寻找永恒》），正在以“有限”为理论切入点，打开鲁迅的各个思想扇面，阐述其文化价值观。而此中所谓“有限”，即是相对于“无限”、“永恒”、“圆满”、“大全”的一个范畴，是一个与“中间物”等义的用语。

于是想搜求批评文章读一读，以便借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然而不果。准确地说，是失望。其中没有学术之论，多是一些大家熟悉了的话语，不足道亦无可观。只好反身自审，重新检查和推敲自己的思路。我一时不能驳倒自己，不得不按照既有的逻辑写毕、修改、交稿。最后一章的“合题”阙如，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想留下一个余地，宁缺毋滥。人应该谦虚，对存疑的东西不妨“括号”起来，这本是

学术上应有的老实态度。但是交稿以后，思前想后，有感于对人的不公道，也为了突出问题，引起鲁研界注意，我致信出版社，索性在书名中把“有限”换成“中间物”。再往后，这种不公道似乎已成过去，于是又建议出版社“否定之否定”，可是晚了，封页已经铸就。一如读者所看到的那个模样。

现在看来，从思想大端言，这不能说怎样的大错，但多少有点“少”不更事或意气用事。而从技术上讲，该书并没有对“中间物”的原委及其同“有限”之关系作正面阐述，这是失当的。它来不及对此作一种应有的深度挖掘，充其量做了一些初始工作。尤其是没有更明白的归纳性交代，给人以模糊之感。

严格地说，书名中的“中间物”之“物”字是不可以省掉的。因为“中间”虽可以读作“中介”、“环节”、“过渡”、“暂时”、“易逝”物，但容易与指谓终极的“中”、“中庸”、“中道”混淆。而“中”、“中庸”、“中道”，无论在中国经典文化中，还是在西洋哲学中，均具有“无限”、“终极”、“至正”、“圆满”、“不偏不倚”之义。如果这样去读，意旨则全然相反：这种形而上学的终极实体正是鲁迅的“中间物”概念首先要消解的对象。

尽管有着这么多问题，并且论述很不深刻，但以“中间物”概念为逻辑起点来描述鲁迅的作法，却不能说是轻率的。“由中间（物）寻找无限”的说法也不是故弄玄虚。我至今认为，这是尽可能采取的通俗而不违其大旨的学术性表述。

用“中间物”三个字作为借代，用以“标示……鲁迅个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和“深刻的自我意识”，用以概括鲁迅的